

居今与志古

——宋代《春秋》学研究

孙旭红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居今与志古

——宋代《春秋》学研究

孙旭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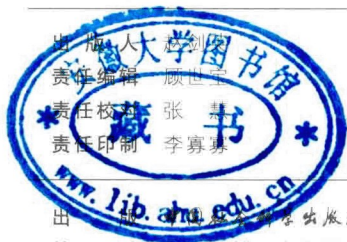
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孙旭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805 - 1

I. ①居… II. ①孙…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宋代IV.

①Z126. 17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1329 号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39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引言	(1)
二 研究现状分析	(7)
第一章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27)
第一节 经学变古与理学勃兴	(30)
第二节 理贵自得与己意解经	(54)
第三节 理学纲常与经传伦理	(73)
附论 渗透的趋势:《春秋》学的理学化	(96)
第二章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100)
第一节 经承旧史、史承赴告	(103)
第二节 因史制经、缘经求义	(116)
第三节 经史交融、以史通经	(131)
小结 经世与借鉴:经、史之分的两难	(146)
第三章 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	(152)
第一节 心术之异论王霸	(153)
第二节 义利、理欲辨王霸	(170)

2 居今与志古

第三节 尊王攘夷论王霸	(184)
小结 往故与将来:王霸之辨的意义与局限	(205)
第四章 宋代《春秋》经解的基本方法	(208)
第一节 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经解的内在依据	(210)
一 赵盾弑君例	(211)
二 许止弑君例	(224)
小结 原事与逆志:求情责实的尴尬	(228)
第二节 别嫌明微、正名定分:经解的诠释方向	(230)
一 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例	(230)
二 卫世子蒯聩出奔宋例	(238)
小结 正名与褒贬:以经义诉诸秩序的努力	(245)
第三节 权者反经、有善乃为:经解中的经权关系	(249)
一 宋人执祭仲例	(250)
二 孔父、仇牧、荀息死君难例	(260)
小结 反经与行权:变相的褒贬书例	(265)
第五章 始隐与获麟:宋代《春秋》学的问题意识	(269)
第一节 感麟而作与文成致麟:绝笔的意义追寻	(270)
一 西狩获麟与黜周王鲁	(270)
二 感麟而作与文成致麟	(284)
小结 蜕变与新生:获麟之义的因革损益	(295)
第二节 拨乱反正与百王大法:始隐与撰作之旨	(300)
一 《春秋》为“尊王”与“拨乱反正”而作	(306)
二 《春秋》为天下后世而作	(315)
三 《春秋》为是非善恶、存理灭欲而作	(322)
小结 沉潜与执着:“始隐”的经世诉求	(334)

结论 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的整体评价	(339)
一 “明体达用”观念下的治经典范	(340)
二 “回归原典”运动中的反省意识	(347)
三 “内”、“外”困境下的惯性缺陷	(352)
参考文献	(355)

绪 论

一 引言

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不仅是士人学子皓首以对的研习对象，更是他们安身立命进而出相入将、经邦济世的首选途径。特别是汉代，儒家经典被确立为“官学”进而成为“经学”之后，“经典”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更是处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①而“六经”之中的《春秋》，由于文本自身的特殊性，即可以提供学者在“既思往古”的历史追寻中寻找现实的立足点，更是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春秋》学”，经由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诠释和阐发，《春秋》“大义”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理念。

至宋代，在政治形势及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学

^①（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页。王洪军对汉代儒生博士群体的心态进行过细腻的挖掘，他说：“儒家经典和帝国最高权力的结合，使经典本身涂抹上了神圣化、神秘化的辉光，经典所蕴含的圣道理想的诱惑以及对于士人功利之心的鼓励，流转在汉代博士文人群体心灵之中，形成了趋同的文化心理和政治品格。”笔者以为，此种心态可以视为整个传统社会儒生群体的集体写照，也是儒家经典文本得以在历代不断演绎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王洪军《汉代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2 居今与志古

者普遍将“‘文化’视为天下治道的价值依据，把思想学术作为拯救世道人心的根本途径”^①，由此，“引经据典”成为宋代学者言行进退经常采用的方式，经典注疏的形式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学者反对汉唐儒生埋首训诂的解经方式，而提倡直寻经义、阐发经典义旨为解经归宿。因此，《春秋》学也改变了自汉代以来的“注疏”之风，而着重于直抒胸臆式的“阐发”。因此，宋代《春秋》学形成了迥异于前代的治经风格：一是研治人数众多，形成了上至帝王、下至学者的研读群体；二是《春秋》主旨鲜明，学者借经以言政的倾向十分明显^②；三是大多遵循尊经废传、会通三传的解经方法。另外，这些治经风格的形成又与宋代的政治形势、学术思潮等相互影响，一起构成了宋代《春秋》学独特的面貌。如何认识这一面貌并阐释其产生、演变的过程，如何从学理上来揭示其本质和特点，怎样对它进行评价，如何依据传统学术和宋代文化背景来对它的地位和意义进行客观归纳等，回答这些问题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宋代《春秋》学的整体特征，也要从微观上具体分析这些特征成因、发展和演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会推动宋代学术文化研究的进展。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宋代之前《春秋》

① 王健：《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朱熹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② 苏辙曾总结汉唐经学的特点，也道出了宋代经学所着力之处，其言曰：“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故两汉之间，经各有师，师各有说。异师殊说，相攻如仇讎。异己者虽善不从，同己者虽恶不弃。下逮魏晋，争者少止，然后学者相与推究众说，从其所长。至唐而传疏之学具，由是学者始会于一。数百年之间，凡所以经世之用，君臣父子之义，礼乐刑政之本，何所不取于此？然而穷理不深，而讲道不切，学者因其成文而师之，以为足矣。”（宋）苏辙：《栞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444页。正是因为汉唐经学的“穷理不深”这一痼疾，宋代才出现“谈《春秋》者日盛”的局面。

学发展的历程，以便为下文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提供一个“前理解”。

西汉经学甫立，但当时对经学解释并没有强求统一。《春秋》公羊学者由于密切关注秦汉鼎革后的国家统治秩序而富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公羊学也随之上升为显学中的显学，官僚与学者用《春秋》议礼、决狱、论灾异等。但汉朝因崇重经学而开辟“禄利之路”以后，经学内部便开始了长期的争立学官的斗争，在此消彼长的各擅胜场之后，“《春秋》学”实际上被人为切割为“三传”之学，《春秋》学内部也因为今文、古文之争等原因而使得同为解经之作的三传被严分畛域。只是在分化的过程中，由于公羊学被掺杂了讖纬之学而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逐渐式微，《左传》则在贾逵、服虔等古文家的注解下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典的地位明显上升，《左传》最终因得到汉光武帝的支持而被立于学官，虽然短时期内被废，但古文学派的发展却越来越兴盛，至汉章帝重用贾逵，“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①。这是古文学派在东汉时取得的决定性胜利^②。

魏晋时期，由于国家政权的频繁交替以及仕途选拔标准的改变等因素，经学发展的环境远不如汉代，进入所谓的“衰败”时期，但也正是由于当时政权更替频繁等原因，儒生对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9页。

② 虽然东汉何休力图挽回公羊学的颓势，但何休本人生于讖纬盛行的东汉时期，他不但无法清除这一“痼疾”对《公羊》义理的浸染，反而不自觉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汉晚期的经学大师郑玄，虽然号称兼采三传，但总的倾向是以《左传》为宗，因此，《左传》的地位是不断得到加强的。

4 居今与志古

经文的阐释还是有着相当自由的环境^①。此时，今古文经学的地位也发生了彻底的扭转，士人所习大都为古文经典。在这一风气下，《左传》则由西晋初的征西将军杜预吸收东汉贾逵、服虔等人成果著成《春秋经传集解》，东晋后期，范宁集合父兄子弟之力共同完成《春秋穀梁传集解》。至此，《春秋》一经“三传”均具有自己的“标准”文本和说解体系，因此可以认为，《春秋》之学的研讨差不多是从两汉的“经学”阶段进入到六朝隋唐的“传学”阶段了。

延至隋唐，随着国家统一的完成，经学内部长期以来形成的各自为说的局面也面临着“统一”。隋代国祚短暂，这一任务自然由唐代来完成。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下，以统一经典文本为职志的《五经正义》在孔颖达的领衔下最终修成，虽然《五经正义》号称“兼收并蓄”，但从其外在形式上说，它仍然表现为一家独尊的态势，所谓“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②，客观上体现出泯灭了今古文之争的倾向，但从其对经义的创获上来说则显得较无进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五经正义》编修这一经学史上的盛事，与其伴随的却是经学发展的迟滞。

《五经正义》以“集体的智慧”代替了个人的理解，并否定了其它著述存在的合理性，加之唐代科举取士制度的推动，《五经正义》在成为钦定经典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经学思想发

① 刘惠琴认为魏晋时期的儒学发展处于一个“调适”时期：“魏晋时代玄学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使得自汉末始衰的经学更趋衰落，然而，汉代旧经学传统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儒学经学仍保持传延不绝，并间有新作出世，处于缓慢发展及选择调整过程中，在理论探索上向义理化方向发展的尝试，是儒家经学调适发展的表现。”刘惠琴：《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展的藩篱。武后统治时期，上述局面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由于敕定之《正义》逐渐沦为应试者的干禄进阶工具，魏知古、徐坚、刘知几、王元感等人开始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疑经”的批判，这使得怀疑的微风终于吹动了经学思想界平静的湖面。虽然这股冲击未能完全动摇《五经正义》的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松绑了传统经说在诠释学上的桎梏。这种“松动”在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再度获得滋生，表现在儒学研究上，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则是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派。他们在动荡的世局下对传统学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重点抉发《春秋》“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的精神，提倡会通三传，以意去取的解经方法等。他们这种解经方法，在宋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与学术环境下得到了汪洋恣肆的发展^①。实际上，宋代众多投身研究《春秋》的士人，很多并非如汉唐时期的经师，而是普通的文人。这事实上反映了一股渐增的趋势：尽管宋代的儒学复兴由文人构成，但他们逐渐不满以文学的手段从事思想的复兴，而是希望以更直接的方式，促成儒家的理想。在这个趋势中，《春秋》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参与儒家复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人特性被转化了，同样地，他们从事《春秋》研究时，亦有助于转化原有的旧传

① 宋代学者晁公武曾以啖助学派为分界，比较啖、赵以前学者的读经态度：“公武尝学《春秋》，阅古今诸儒之说多矣。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晁氏虽然在抨击啖助学派的解经之弊，但在客观上也说明了啖助学派对后学的影响。

6 居今与志古

统了^①。因此，他们不但怀疑经典，也非议传注，并由此发展出以意解经的学风，推动了《春秋》学发展至一个新的阶段^②。

总之，经学自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之后，其沿革变迁，盛衰消长，便与整个古代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宋代《春秋》学的发展虽别具风格，但其发展仍然要墨守前人既有的部分规范^③，还要受到时时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更要遵循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在宋儒的阐发下，《春秋》经义的学理系统与极为切近的现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这种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规范政治的价值理念，并进一步将此理念贯彻到社会政治的具体操作中去，最终完成当时学者群体希冀的理想与现实结合的“明体达用”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春秋》的经义便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且还广泛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及百姓日常活动的多个领域，成为指导和制约人们思维言行的基本价值准则^④。宋儒就是要以这种“准则”来规范唐末五代以来“人

① 此段后半部分论述转化于 Jo - Shui Chen, Liu Tsung - Yuan, pp. 143 - 144, 转引自汪政宽《皮日休的生平与思想——兼论其在唐宋之际思想变迁中的角色》，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页。

② 皮锡瑞对此新阶段的评价是：“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9 页。

③ 虽然宋儒继承啖助学派以己意说经的解经方法，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对前人的因袭仍然很多，具体可见正文部分相关内容。

④ 姜广辉论古代经典的意义时曾说道：“在古代，‘经典’二字，不是可以滥用的，它特指圣贤所作之书，是人们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经’有‘常’的意义，是人类社会的常行之道；‘经’也有‘法’的意义，人们通常说‘大经大法’，即有必须遵照执行的意思。对经典的尊奉是通过对经典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这属于信仰的层面，也可以说属于价值的层面。”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欲横流”的现实世界，重新树立以“天理”为终极意义的精神信仰^①。只不过与汉儒迥异的是，学者期待重新建立这种信仰的途径是过度依赖个体“转向内在”的方式而已，他们对礼乐文化所作的人文理性的转换和普世价值的升华，又打开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精神空间，这正如陈庆新所论，宋儒对《春秋》学的贡献“远远凌驾历代学者之上。汉学家的成绩，止是在章句训诂方面，并未能赋予《春秋》以活泼泼的生命。宋儒却不然，一部千多年的古书，在他们手里复活了，一份‘断烂朝报’，与两宋三百二十年的历史血肉相连地结合起来。”^②因此，本书虽然只是选择众多经典中的《春秋》为主要论题，却意欲通过此选题的探讨来分析在宋代《春秋》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如何对既有的“《春秋》学”进行扬弃，又是如何在这种扬弃中实现上述种种重建信仰与新秩序的努力。

二 研究现状分析

1. 宏观分析

宋代治《春秋》者很多，《宋史·艺文志》共著录有二百四十部左右，计二千七百九十九卷，这些著作主要为宋人所完成，清人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宋人《春秋》学著述更在四百种以上。据刘琳、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

① 马宗霍曾对宋代经学评价道：“宋人经学，其有不守陈义，自辟新术，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或折衷古训，或独抒别裁，或以议论相高，或以综比矜富，或陈往以讽今，或明体而达用，既异汉唐之古训，复殊道学之义理，斯又极宋学之变而不相统摄者也。”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119—121页。

② 陈庆新：《宋儒春秋要义的发微与其政治思想》，《新亚学报》第十卷第一期上。

8 居今与志古

1995年版)统计的宋人经部著述,《春秋》类也多达六十四种,仅次于《易》类,位居第二。唐君毅在论及宋代治学次第时也说:“宋学之初起,乃是以经学开其先。在经学之中,则先是《春秋》与《易》见重,然后及于《诗》、《书》之经学,再及于《易传》、《中庸》、《大学》及《孟子》、《论语》等汉唐人所谓五经之传记。”^①可见,《春秋》是宋人研治最多的经典。马宗霍在论及宋代经学时指出:

《易》与《春秋》,作者尤繁。盖《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一明天道,一明人事,惟人所说,不必征实。故自王弼废象数,而谈《易》者日增;自啖助废“三传”,而谈《春秋》者日盛。空言易骋,亦不独宋儒为然矣。又南渡而后,国势不振,士大夫愤夷祸之日亟,痛恢复之难期,情殷中兴,念切雪耻,无以寄志,退而著书,则垂戒莫显乎《易》象,复仇莫大于《春秋》,趋治二经,殆亦有不获已者焉^②。

这里,对宋代《春秋》学的兴盛,既分析了理论上的原因,又分析了其社会原因。范文澜也说:“宋代讲《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着孔子名义来重整伦常的。北宋时尊王。南宋时,北方被金人夺去了,除尊王外,还要讲攘夷。”^③“尊王攘夷”是《春秋》的“大义”之一,正因为它满足了宋代国家

①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121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政治生活的需要，所以《春秋》学在宋代的兴盛，也就是必然的了。

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宋代《春秋》学研究方面的专著问世。已有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经学史或相关专著的一部分，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之《经学变古时代》、陈延杰的《经学概论》、伍宪子的《经学通论》、泷熊之助的《中国经学史概说》、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之《宋之经学》、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之《唐宋元明的经学》、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之《宋代经学概观》、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之《宋元明之〈春秋〉学》等，其中大多概述群经总貌或分述各阶段经学发展史，但此种研究在笔者看来在整体上并未超越皮氏《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的研究水准。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奠定了新时期经学研究的基础，但周先生的研究还没有具体到对历代经学断代发展的细致分析。另一种是单篇论文，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宋代《春秋》学的部分面貌。因此，以上研究成果中大多涉及宋代《春秋》学的零星片段，其研究成果与宋代《春秋》学自身的著述成果远未相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春秋》学姗姗步入学人的视域。对宋代著名的《春秋》学人及其著作均有大量的研究，但整体来看，这些研究的“基调”大致不出牟润孙在《两宋春秋学的主流》^①一文中对宋代《春秋》学特征的概括——即“尊王攘夷”的《春秋》主旨。这一因袭直至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出版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该书在概述两宋《春秋》名家后，集中笔墨就“尊王说”、“攘夷说”、“复仇说”、“自

^① 原刊于《宋史研究集》第三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年，第103—121页，后收入《注史斋丛稿》。

强说”、“守土说”、“戒兵说”、“和议说”等宋代《春秋》学的主题展开了详尽的论述，该书既是对牟文的补充和扩展，也是为宋代《春秋》学的整体内容进行了更深层次以及更大范围的奠基^①，以至于今天见到的众多相关研究中，如张国刚、乔治忠主编《中国学术史》之相关章节、章权才《宋明经学史》等^②，由于这些成果本身并非是对宋代《春秋》学的专题研究，所以其相关结论也依然很难跳出牟、宋二人的学术范围。

对几种具有代表意义研究成果的分析：

如所周知，学术领域中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仅仅取决于成果的数量；只有表层的平推、扩展远远不够。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我们可以填补很多“空白”；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一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学术思想等等的深度理解。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论述及此，本文意欲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部专著或学位论文进行重点分析：

首先是李建军的《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③。该书原先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大陆书名中含有“宋代《春秋》学”的第一部著作。在该书中，作者在概述了宋代《春

① 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祁润兴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由于偏重点各异，于宋代《春秋》学的研究属于整体性的描述。

③ 李建军：《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因为作者在书中的开头部分，已经详细列举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春秋》学研究的成果，兹不赘列。

秋》学的发展历程后，重点论述宋代《春秋》学与政治、理学、文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以此论证了“宋型文化”对宋代《春秋》学发展路向的引领，以及宋代《春秋》学对宋型文化衍生的催化和推动等，可以说，这些研究对于宋代学术史的众多领域都有很多启发意义，开启了宋代《春秋》学研究的众多面向，对《春秋》宋学本身的描述和论证也值得称赞。

但是，就作者选题本身而言，“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显然是在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文化学意味浓厚的研究取向，十分轻易地会陷入片面和轻率的误区。例如，“宋代《春秋》学对士节世风的砥砺涵育”一节中，作者认为胡安国知行合一卓有气节、吕大圭以身殉国大节凛凛、家铉翁义不二君彰显士节都是《春秋》大法所“砥砺”，这种说法脱离整个宋代社会环境等因素，而将士风振起只归因于《春秋》学的砥砺，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当然这并非本文所讨论的重点）。其次，铺设的面太多，必然会造成论述中心分散难以聚焦。以一篇学位论文而欲囊括宋代《春秋》学与政治、史学、理学、文学等之间的关系，显然会捉襟见肘而难以兼顾。再次，就作者选题的限制，对宋代《春秋》学的本身的研究尚有不足，这表现在该书既未涉及宋儒解读《春秋》时所具有的“前理解”，也未触及《春秋》学演进至宋代时其诸多基本问题、诠释路向等发生的变化，因此，这部著作的局限性还是有待完善的。

其次，是葛焕礼的《八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初的“新〈春秋〉学”》^①。该文选题的优点在于肯定了中唐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对北宋《春秋》学的影响，因此，将“八世纪中

^① 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3年。